

文献保护 专刊

Document Protection Issue

主办：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
图书馆报
2020年5月22日
第11期



06 业界动态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黑龙江省图书馆推出“籍合网”古籍资源试用

07 镇馆之宝

郑州图书馆所藏珍本选介
文史并重 版本罕见

08 镇馆之宝

景德镇市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
内容丰富 特色鲜明

09 业务探讨

从《洛阳伽蓝记》
看书根有文字古籍的修复

10 业务探讨

中小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刍议

11 图书推荐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
《君子人格六讲》

12 图书推荐

《格致·考工·源流：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
《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联合黑龙江省图书馆推出“籍合网”古籍资源试用

本报讯 近日,国家古保中心联合黑龙江省图书馆推出“籍合网”古籍资源试用(为期三个月)。

“籍合网”是国内首款古籍整理与数字化综合服务平台,由中华书局下属古联(北京)数字传媒科技有限公司负责建设和运营。“籍合网”集中整合了多种古籍数字化产品。《中华经典古籍库》是目前正在运营的重点产品。其资源以中华书局整理本古籍图书为核心,同时涵盖多家专业出版社的古籍整理成果,截至2018年,上线资源已达到1900余种,总计约10亿字,数据资源以

及合作出版社还在持续增加。该产品目前已经成为专业领域内最权威的古籍整理数据库。此外,“籍合网”整合的数字产品还包括《中华文史学术论著库》《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中华善本古籍数据库》《中华文史工具书数据库》等,可满足不同用户的阅读与研究需求。

同时,“籍合网”推出了古籍在线整理和发布系统。“古籍在线整理平台”是大型、综合性在线古籍编辑平台。该平台通过众包的形式组织在线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了标点、注释、校勘、翻译等在线编辑模块,极大

地提高了古籍整理与编辑效率;同时与其他数据库产品链接,在强大的资源支撑下,古籍整理者可以方便地参考、取用已有成果,使古籍整理的质量有了强有力的保障。在线整理成果将与《中华经典古籍库》的全部资源一并通过“古籍整理发布平台”对外进行发布,可供用户及时阅读最新的古籍整理成果。

此外,“籍合网”还将提供一个在传统文化领域独树一帜的社区“古籍圈”。“古籍圈”赋予用户自由发问、发表和建组讨论的权利,并根据用户的关注进



行个性化推送。用户可以通过“古籍圈”分享随笔、研究心得等个性文章,同时针对数据库产品使用、古籍整理或研究的

相关问题,随时在线提问,互助解决问题;也可以根据个性化的需求结成组群,进行内部讨论和分享。

辽图推出“云品鉴”,民众线上对话馆藏古籍

本报讯 “书页泛黄,岁月沧桑,好整齐的笔迹。”“刊刻精美,墨色清润,古人的智慧让我钦佩。”近日,由辽宁省图书馆推出的“馆藏古籍品鉴”活动在线上举行,读者纷纷留言感叹。

辽图是首批国家重点古籍保护单位,馆藏珍贵古籍文献61万余册,善本书12万余册,宋元版书100余部。据辽图古籍文献中心主任刘冰介绍,为满足民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辽图推出的“馆藏古籍品鉴”活动,意在通过线上品鉴古籍,使民众足不出户“走”进古书世界,体验其中典雅的诗意之美与书籍流转的沧

桑传奇。

本次活动共品鉴《抱朴子内篇》《扬子法言》《周易》《明珠记》《琵琶记》《聊斋志异》《御制盛京赋》等8部古籍,分8期进行。“这些古籍精心挑选自12万册善本,它们跨越了从南宋至清朝的历史时空,囊括了稿本、刻本、套印本、绘本等不同版本类型,是馆藏中最具代表性的缥緗精品。”刘冰如是说。

最受读者关注的当属镇馆之宝《聊斋志异》。刘冰说,《聊斋志异》是中国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独特的地位。令读者

叹为观止的还有精选自馆藏119种明清刻书的《琵琶记》《明珠记》两部作品。其书籍版式疏朗,字体方正;书中版画构图优美,线条绝精,在中国版画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在《明珠记》的代表刊本中,刻书者把明代版画和套印技艺有机结合在一起,达到了创意、设计、印刷的完美结合。

刘冰说,古籍是历代先贤智慧的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读古籍,可明智,可怡情;可固德,可养性。与传统阅读相比,本次活动使民众更直观地感受到古籍中极高的艺术性与珍贵的文物性。

图书馆古籍虫霉防治行业标准发布

本报讯 近日,文化和旅游部在官网发布2020年第一批文化和旅游行业标准,包括《图书馆古籍虫霉防治指南》(WH/T88-2020)等5项行业标准。

《图书馆古籍虫霉防治指南》针对古籍收藏的特殊环境和使用的具体现状,以有害生物综合治理的“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综合治理”为原则制定,旨在为各类古籍收藏单位开展古籍保护工作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指导。

西藏罗布林卡完成1000余函古籍普查



本报讯 截至目前,罗布林卡已完成5座宫殿1000余函古籍普查登记和可移动文物普查,其中普查鉴定国家一级文物古籍57函。罗布林卡是西藏世界文化遗产之一,始建于18世纪中叶,曾是历代达赖喇嘛消夏理政的地方。

罗布林卡管理处文物科工作人员索朗次珍介绍,目前,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和罗布林卡管理处正在联合进行古籍普查登记和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已经完成达旦明久颇章、格桑颇章、格桑颇章、夏典拉康等5座宫殿的古籍普查,还有一处准增颇章,是罗布林卡古籍存量最大的宫殿。

索朗次珍说,双方合作普查文物古籍,涉及内容复杂,重量、尺寸、图片、判定破损、年代等需一一记录,

“每函古籍数百页,破损严重的更需要每页查阅登记,所以一天最多只能普查7函到10函。”

目前,罗布林卡已完成古籍普查1000余函,其中年代最早的古籍可追溯到公元16世纪,数量以清代为多。经普查鉴定,其中国家一级文物古籍57函。“罗布林卡是西藏古籍重点收藏和保护单位。”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工作人员才洛介绍,它同布达拉宫是该中心去年和今年的古籍普查重心,预计今年可完成600至700函古籍普查。才洛表示,西藏保存着大量藏文古籍,现存世藏文古籍总数约占中国的三分之二,全区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自2009年启动。启动以来,已普查登记18000余函古籍,其中2019年完成布达拉宫1256函、日喀则扎什伦布寺1188函。

云南省图书馆赴普洱等地调研古籍保护和“国门文化”建设工作

本报讯 按照云南省文旅厅2020年工作布署和要求,结合2020年云南省古籍保护工作实际和云南省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相关州(市)、县民族古籍保护和“国门文化”建设工作,为促进基层图书馆服务效能提升,云南省图书馆馆长、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马云川,云南省图书馆总支书记任荣贵,云南省

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古籍保护中心副主任计思诚等5名人员,于近日到普洱市、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保山市及墨江县、凤庆县、昌宁县等地,就古籍保护和“国门文化”建设等工作进行调研。

通过此次调研,较为准确地掌握了云南省相关州(市)、县民族古籍保护工作,特别是区域

内少数民族古籍收藏、保护、修复、数字化等方面的具体做法、成果和存在问题,详细了解了相关州(市)、县加强“国门文化”建设的必要性和建设配置需求,为下一步更好地提升边疆民族地区基层图书馆服务效能、推进古籍保护工作、推动“国门文化”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西藏首批“云共享”珍贵古籍文献正式上线

本报讯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首批“云共享”馆藏珍贵古籍文献近日正式上线试运行,标志着西藏迈入古籍文献“云阅读”时代。这次试运行上线的首批珍贵古籍文献总计达50函、6581叶,内容涉及藏族历代学者传记、西藏历史及各地佛教史等,其中包括《阿底峡大师传》(写本)、《阿底峡大师自传》(写本)、《玛尔巴译师传》(阿里贡塘刻本)、《萨迦班智达传》(公元17世纪刻本)、《夏鲁译师传》(朱印刻本)、《萨迦世系之稀奇宝典》(17世纪刻本)、《汉地

佛教史》(刻本)、《青史》(15世纪刻本)、《布顿教派史》(刻本)等。

西藏自治区古籍保护中心主任边巴次仁说:“此举是为营造全社会参与古籍保护事业的良好氛围,推动西藏古籍保护利用事业健康发展,让更多古籍文献发挥服务社会的功能。”

西藏自治区图书馆还同步首次在线发布了34部自治区第一、二、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雪域宝典——西藏自治区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推出

了微视频《走近藏文古籍——藏文古籍基础知识》《走近藏文古籍——藏文古籍修复技艺演示》等内容。

近年来,西藏不断加大古籍文献保护修复和整理出版力度,推动古籍文献“数字化”。截至目前,西藏已完成18000余函古籍文献的普查登记;累计修复近3000叶濒危古籍文献;291函古籍成功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编纂出版《雪域宝典》等数十本系列藏文古籍普查保护成果丛书,完成14个基层古籍收藏单位条件改善项目等。

郑州图书馆所藏珍本选介 文史并重 版本罕见

郑州图书馆自1999年以来,连续五次被文化部评定为国家一级图书馆,已成为郑州市重要的文献信息中心、社会教育中心、文化休闲中心和学术研究中心之一。2010年5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郑州图书馆馆藏古籍6万册,其中珍本、善本3000余册。有117部古籍被《中国古籍善本书目》收录,有17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郑州图书馆收藏古籍中刊印最早的一部是元元统二年(1334)梅溪书院刻本《韵府群玉》。其余如明正统十二年(1447)内府刻本《书集传》、明弘治元年(1488)刻本《文选》、明弘治七年(1494)刘氏安正书堂刻本《新增说文韵府群玉》、明隆庆五年(1571)兴正堂刻本《春秋胡传》、明万历刻本《汜乘》、清乾隆间抄本《三国志玉玺传》也都是稀见之本。下面就明万历刻本《汜乘》、清乾隆抄本《三国志玉玺传》重点介绍。

《汜乘》

此万历刻本《汜乘》,据各家藏目,惟郑州图书馆存有一部,或谓孤本,抑或谓海内孤本。此本线装,凡36页,开本高28.8厘米、宽17.2厘米,版框高22.6厘米、宽15.0厘米,半页9行,行19字,白口,四周双边。《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史部》9154号即此本,《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亦录之。汜者,汜水县之谓。以汜水由巩义东北流,经此地注入黄河,故名。乘,音同圣,史书之谓。《孟子·离娄下》:“晋之《乘》、楚之《檮杌》、鲁之《春秋》,一也。”汉赵岐注:“此三大国史记之名异。乘者,兴于田赋乘马之事,因以为名。”汜乘,即汜水一地之史书也。

此本仅存卷三《官制纪》,《官制纪》者,职官表之谓也。其于知县记至杜汝亮,云:“直隶永年人。由举人初授洛阳令,万历四十二年补汜水,以见任率修县志,例不立传。”据此可知《汜乘》纂修于万历年无疑。别据民国《汜水县志》卷三《名宦》:“杜汝亮,字怀容,万历甲午举人。初授洛阳令,万历四十三年补汜水。尝敦请耆英,博求裨乘,编次汜志,未竟,升应州知州。”则《汜乘》之纂修,杜汝亮未竣其役。据乾隆《汜水县志》卷五《职官》,所记杜汝亮之后知县事者,有徐成治、袁守聘、刘景阳(以上天启间)、张懋华、刘邦道、李原玄、王国楠、胡海定、周腾蛟(以上崇禎间)、高永光、佟世科、郭瑀第、钟无暇、刘桐山、吴与俦(以上顺治间),皆无踵其事者。《官制纪》于县丞记至傅大受,云:“字焘乡。湖广沔阳人,由选贡初任新贵知县,改汜水丞。

现任。”于教谕记至易同人,云:“应天上元人,现任。”于训导记至孙光绍,云:“河南洛阳人,现任。”皆与卷端所题“知县事杜汝亮订刊,县丞傅大受、教谕易同人全校,训导孙光绍、邑庠廩生郑人文考集”相合。

《官制纪》叙曰:“藉其有敷泽一时留声永久者,前后不乏,第世远人湮,汉唐而下,代不一二人,人不一二事。我明亦仅识其姓氏,不能按其状而传之也。兹特拾之遗编,采之口铭,以著于纪录。间有漏佚,俟后闻续入焉。其目十一,曰牧正、曰丞丞、曰簿职、曰尉职、曰教谕、曰训导、曰驿丞、曰巡检、曰训术、曰训科、曰镇将,见于左。”据其末句,则鄙馆度此一卷,亦有散佚。训术、训科、镇将三目即未存焉。

据统计,此卷录牧正凡69人,上起春秋,下至明朝;录丞丞凡33人,皆明;录簿职凡5人;录尉职凡47人;录教谕凡41人;录训导凡44人;录驿丞凡5人;录巡检凡4人。

汜水旧志,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原文化大典·著述典》,凡7部。其中纂修于明代者4部,明田景暉纂修[弘治]《汜水县志》,有明弘治十一年(1498)刻本,其书久佚,卷数无考;明林椿纂修[嘉靖]《汜水县志》,或有明嘉靖十六年稿本,其书散亡,卷数无考;明萧胤纂修[嘉靖]《汜水县志》六卷,有明抄本。第四部即此万历刻本《汜乘》。换言之,明代汜水旧志刻本,现存者独此一部,虽为残本,亦弥足珍贵。

《三国志玉玺传》

弹词《三国志玉玺传》一书过去从未刻印过,只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赵景深所藏残本仅存5卷。郑州图书馆馆藏清乾隆抄本《三国志玉玺传》为此书现存唯一足本。本书纸捻毛装,共20卷,两卷一册,共分装为10册,半叶12行,行3栏,开本高24.2厘米、宽17.0厘米。《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集部》22737号即此本。正文毛边纸抄写,纸上有“吴义然号”“川太史纸汪氏”等朱印;字体、墨色浓淡不一,多俗体字和借用字,偶有脱文缺句和个别修改之处。第一册前于封面之后,有后人据《三国演义》回目加的卷目一页,端题“三国志玉玺传目录”。卷一、卷二、卷三、卷七和卷八等卷端题“抄录三国志卷上”“三国志第二卷”“新录三国志玉玺传卷之三”“三国志玉玺传”,余下各卷卷端均不题,不著撰者姓氏。书中第二卷末叶有“乾隆元年录”,卷四末有“乾隆十三年九月抄录,立”,卷十一末有“乙亥巧月,郑抄录”,卷二十末有“乾隆乙亥年夏日抄录”,乾隆乙亥为乾隆二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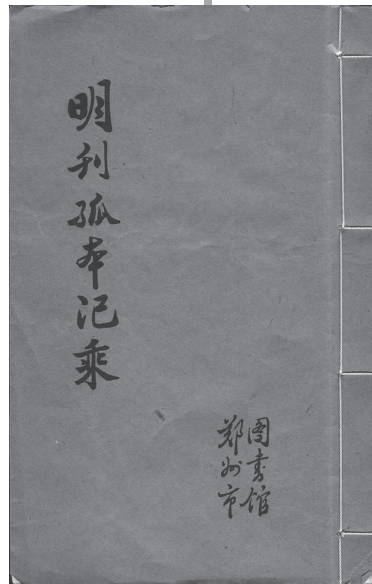
年(1755年),巧月为农历七月。据此判断,本书为清乾隆元年(1736)至二十年间抄本。

《三国志玉玺传》虽脱胎于三国故事,但与清康熙年间的毛宗岗本《三国演义》有一定的不同之处。结构上,在首尾贯穿了刘备与邢姣花的恋爱和两世因缘,人物的情感描写基本按照明清通俗文艺作品中才子佳人恋爱故事的模式进行谱写。“玉玺”指汉代的传国玉玺,是故事展开的线索。故事发生在东汉末年战乱背景下,刘备阴差阳错得到玉玺,被邢姣花相救,刘备感激,约为婚姻,并将玉玺赠与她,俾便进京献宝请赏。姣花却为董卓所掳,怀抱玉玺投井而死。本书的卷十八至卷二十中,记载了投井而死的邢姣花托生为蜀将吴懿之妹,刘备称帝后,娶吴懿妹并立为皇后,以邢姣花再生完成了刘备的姻缘。此书还留存有关羽斩貂蝉以及关羽之子花关索的故事情节等等。除具体情节以外,《三国志玉玺传》的叙事节奏和详略与《三国演义》不同。《三国志玉玺传》写至刘备于成都称帝之后,仅在20卷末概述晋灭魏蜀吴,归于统一的过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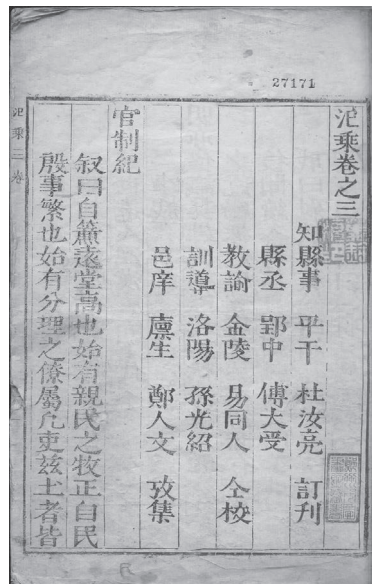
《三国志玉玺传》基本是根据《三国志通俗演义》明代的某个版本改编而成,并受到其他戏曲作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三国志玉玺传》大概是依据嘉靖以前较早的闽本写成(据[英]魏安《三国演义版本考》)。而《三国志玉玺传》的底本恐怕产生得更早,据推测产生于1358年至1368年这十年间,“是《三国志平话》和罗贯中《三国》底本之间的过渡本”(据陈辽《由弹词〈三国志玉玺传〉谈罗贯中的〈三国〉原本》)。就具体文字而言,在三国故事的流变中,此书更接近于二十卷繁本系统或二十卷简本《英雄志传》小系统,受到简本《英雄志传》小系统的影响更大(据[日]中川谕《清代的三国通俗文艺与〈三国演义〉》)。《三国志玉玺传》中的[锁南枝]曲二首与明成化时人王济所撰昆曲《连环计》相差无几(据龚敏《弹词〈三国志玉玺传〉的来源和成书时间考略》)。《三国志玉玺传》素材的来源是多样的,所依据的本子多数产生于明代,那么也从侧面证明,《三国志玉玺传》或许成书于明季或明清之交。

弹词是明清时期流行于江、浙两地的一种说唱文学,多叙述才子佳人的故事,具有“细腻深切”的特征。弹词中也不乏一些以雄浑豪迈的历史为题材的作品,《三国志玉玺传》就是其中之一,甚至可以说是目前流传下来的众多弹词中,改编自《三国志通俗演义》的篇幅最长、故事最完整、最具代表性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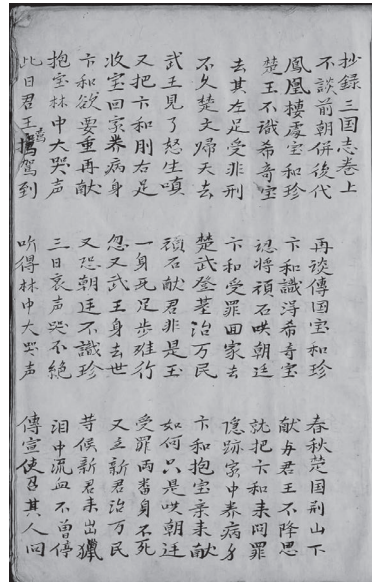
(郑州图书馆李正辉、李昕洁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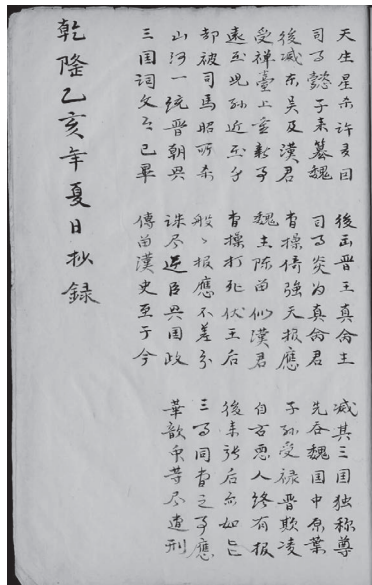
《汜乘》封面



《汜乘》卷三卷端



《三国志玉玺传》正文首卷卷端



《三国志玉玺传》卷20末

景德镇市图书馆馆藏古籍文献 内容丰富 特色鲜明

景德镇市图书馆馆藏古籍、民国时期线装书3万余册。其中善本3020册。善本中包括国家珍贵古籍康熙二十一年版《浮梁县志》及江西省珍贵古籍9部62册。善本古籍中以地方志、史书、名人文集为特色藏品。另有陶瓷类古籍50多部200余册和各类宗谱30部226册,还藏有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四部丛刊》等大型影印古籍图书。

陶瓷古籍众多

景德镇市图书馆收藏多种陶瓷古籍,其中有几部文献尤为突出。康熙二十一年版《浮梁县志》被誉为“古镇百科全书”,被列入《全国善本书目》,视为孤本,2010年,成功入选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012年,《东坡书传》《汉书纂》《礼记省度》《历代史论一编二编》《温飞卿诗集》《文选》《心学宗》《新刊汇编秦汉文选》《渔洋山人精华录笺注》九部古籍入选第一批《江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反映古代陶瓷生产的地方文献《陶录》《陶说》《陶歌》《陶雅》为《辞海》选收,作为历史名著词目进行释文叙述。

景德镇市图书馆古籍中方志有《浮梁县志》《饶州府志》和《江西通志》等。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民国前《浮梁县志》共有五个版本,景德镇市图书馆藏有三个版本:康熙二十一年(1682)刻本,九卷首一卷,王临元修,曹鼎元撰,其中卷四赋役之陶政收录了《陶记》;乾隆四十八年(1783)刻本的油印本,十二卷,程廷济总修,凌汝绵编纂,其中卷五下物产之陶政篇收录了《陶记》《陶冶图编次》;道光十二年(1832)刻本,二十卷,乔淮修,贺熙龄纂,其中卷八食货之陶政篇收录了《陶冶图编次》《陶记》。

陶瓷专著有《景德镇陶录》十卷,(清)蓝浦著,郑廷桂补辑,清同治九年刻本和光绪十七年刻本;《陶说》六卷,(清)朱琰撰,民国三年铅印本;《陶雅》二卷,(清)寂园叟撰,清宣统二年石印本;《陶歌》(清)龚弼撰;《陶人心语》《陶人心语续选》,(清)唐英撰,复印本以及《柴窑发现记》《柴窑考证》等有关景德镇陶瓷的专著。另外还有《江西考古录》《江西全省舆图》以及本地《家谱》等地方文献。

藏品价值颇高

《陶记》是记述我国最著名的瓷器产地——景德镇窑业情况的第一篇专文,也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陶瓷的论著。关于它的作者蒋沂生活的年代学术界尚存在争议,一说是南宋末年,另一说是元代初期。清康熙之后的《浮梁县志》《饶州府志》与《江西通志》中都收录了蒋沂的《陶记》。历史上记载的宋元明时期所修的县志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流传下来,现存最早的《浮梁县

志》是国家图书馆珍藏的康熙二十二年版残本《浮梁县志》,它存有卷一、三、四、六、七,缺少卷八“物产志”,其中是否收录了《陶记》无从得知,所以现存《浮梁县志》中最早收有《陶记》的就是景德镇市图书馆珍藏的康熙二十一年版《浮梁县志》。因为我国古代陶工在陶瓷工艺与陶瓷美术方面成就辉煌,古文献又缺乏记述这个行业的比较具体的文字,所以,不管蒋沂是生活在宋末还是元初,他遗留下来的《陶记》就是人们研究中国瓷器发展史,研究景德镇早期瓷器生产的最早、最难得的文献。

《陶说》全书六卷。卷一《说今》叙述清朝饶州窑(景德镇窑)及其生产过程;卷二《说古》探讨窑器起源并介绍唐宋元名窑及其产品;卷三《说明》介绍明代官窑器及其制瓷工艺;卷四至六《说器》介绍上古至明代各时期陶瓷造型的品种及装饰特征。全书重点为《说今》和《说明》。

《陶说》是我国第一部系统而完整的陶瓷史专著。清朱琰著。朱琰,字桐川,别号笠亭,浙江海盐人,清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四年(1766-1769)为江西巡抚吴绍诗之幕僚。他留心瓷业,深以古无陶瓷史专著为憾事,遂亲自考察景德镇窑业情况,结合古文献考证,在旁征博引的基础上加以引申发挥,按语简要中肯、见解独特。侧重于实用,着重近代和当代,故先“说今”后“说古”。该书的问世不但结束了古无陶瓷史专著的空白,而且为后来者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时至今日,《陶说》仍是研究陶瓷史的必读之书。

《景德镇陶录》十卷,卷一图说,描述了景德镇的地形、御窑厂和从配土到烧炉的二十四道工序的陶成图;卷二原起,叙述清廷在景德镇御窑厂烧制各种御用瓷器及派驻官员督办陶务等事宜;卷三陶务条目,叙述景德镇瓷器生产组合、产品窑别、工种、作坊、瓷器款式,各种釉料与配方及产地;卷四陶务方略,叙述瓷土、胎骨、釉果、釉彩及其产地、特征、用法与运销情况;卷五景德镇历代窑考,并谓清代烧窑器超过前代;卷六镇仿古窑考,对古代名窑如定、汝、龙泉等窑均有所论证;卷七古窑考,附以各郡县窑考及外译窑考,对历代四十五座名窑详为考述;卷八、卷九为《陶说杂编》上下二卷,作者从古籍中的笔记、小说、文集、丛书和方志

里汇录了大批文献资料;卷十为郑廷桂与余有庠等六人所增补。此书为补《陶说》之不足,对景德镇窑瓷器的烧造及历代沿革,均有深入而全面的叙述,是研究中国瓷器史不可缺少的重要参考书。

《陶雅》初名《瓷学》,后又名《古瓷汇考》,是一部研究中国陶瓷史的笔记性质的杂记。作者陈浏,字亮白,号寂园叟,清末民初人,编有《寂园丛书》。

《陶雅》全书分上、中、下三卷,不分章节,总计889个条目,一物一条。其内容涉及中国古代陶瓷造型、釉色、款识以及辨伪、传闻等诸方面。就总体内容而言,很像是记录古玩商人的心得体会及师徒相传的经验与传说,因此略显杂乱。全书分三卷,不知据何而分,完全是未加整理的笔记,在书尾附有9部有关瓷器的著作。后人对此书评价不高,认为错误太多,但去伪存真,由此书可知当时古董商人的鉴定水平,故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景德镇陶歌》是记载景德镇窑业情况的一部诗集,为清嘉庆、道光时人龚弼所著。龚弼,字适父,南昌人。他在浮梁县衙做事期间,将所闻所见记录下来,“为谱之歌诗,得诗百首”,从中精选出60首,题曰“陶歌”,于道光四年(1824)刻印出版。

《景德镇陶歌》所收录的60首诗全系七言四句,无题,但诗后均附有简要的注释说明。其诗吟咏风土人情、陶瓷工艺、历史文化等;注释说明往往画龙点睛,对了解诗的内容有很大帮助。每首诗及诗后注释宛如连环画,形象而真实地记载了景德镇的窑业史,历史、政治、经济、文化、工艺及民俗等几乎无所不有,其中许多内容均为他书未载或记载不详,是研究景德镇陶瓷史的重要文献资料。本书刊刻较少,长期以来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至今未有一部注释本问世。

2011年景德镇市图书馆将馆藏陶瓷古籍文献《陶记》《陶说》《景德镇陶录》《景德镇陶歌》合为一辑题名为《景德镇陶瓷古籍文献精粹》,在扬州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出版,今后还会陆续将一些重要的地方文献影印出版发行,方便读者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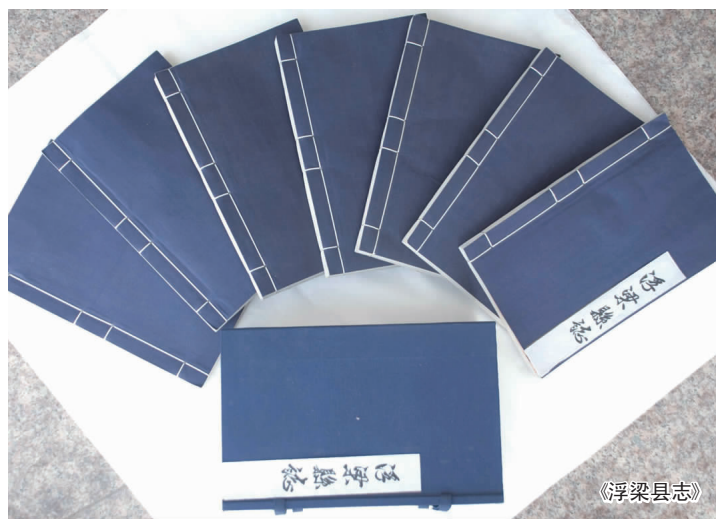
另外,景德镇市图书馆还藏有本地家谱三十余部,包括《相湖冯氏家谱》《嵩峡齐氏宗谱》《南阳刘氏宗谱》《唐原李氏家谱》《昌南黄氏宗谱》等等。这些家谱对研究本地陶瓷历史文化



《景德镇陶录》



《景德镇陶瓷古籍文献精粹》



《浮梁县志》

也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景德镇市图书馆在古籍整理保护工作中做了很多努力,特别是在古籍再生性保护利用、陶瓷地方古籍的挖掘整理、陶瓷地方文献的参考咨询服务、古籍普查、古籍保护经费投入、保护设施完善等方面做了许多实实在在的工作,也得到了各级专家的认可。景德镇市图书馆2012年入选江西省重点古籍保护单位,2016年入选全国重点古籍保护单位,并多次被评为江西省古籍保护先

进单位。景德镇陶瓷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国乃至世界具有重要地位。景德镇市图书馆馆藏特色陶瓷古籍比较全面系统地保存了景德镇古陶瓷文化,它为现代研究者还原瓷业历史提供了依据,有利于现代制瓷工艺的沿袭、保护和发展。景德镇市图书馆将继续致力于古籍的开发和利用,为弘扬景德镇历史文化、振兴瓷都经济砥砺前行。

(景德镇市图书馆副馆长白小燕供稿)



李长红 女,汉族,现为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古籍修复技师,文博助理馆员。2005年毕业于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历史学学士。同年到中国书店参加工作,主要从事古籍鉴定和修复工作,先后师从中国书店版本专家种金明先生、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古籍修复专家汪学军先生、西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修复专家刘秋菊先生,学习古籍版本鉴定和古籍修复技艺。李长红曾参加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市文物局图书资料中心、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国医史文献研究所等机构的古籍修复与保护项目,同时也为个人藏家提供古籍修复服务。修复的代表作品,主要有明版《大般涅槃经》、明版《千金翼方》、明版《元亨疗马经》等。曾发表专业文章数篇,有《从玄秘塔碑的修复案例看传统拓片的修复技法》《按需施修——以文选的修复为例》等。

从《洛阳伽蓝记》 看书根有文字古籍的修复

□李长红(中国书店古籍修复中心)

2020年3月,中国书店古籍修复工作室受藏书家委托修复《洛阳伽蓝记》一书。该书为道光钱塘吴氏刊本,从书品上看,开本阔大,竹纸线装,书角磨损呈圆角状态,书根处写有“洛阳伽蓝记”五个字,字迹端正,清晰可见。翻看书册发现,书口处多呈裂开状态,书口上下角有较大面积的缺损。值得庆幸的是,该书纸张状态较好,无明显老化焦脆现象,为修复和保藏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初步判定该书的修复难点在于对书根字迹的复原。以此为契机,笔者计划将此次的修复经验加以总结,为以后修复书根有文字古籍提供参考。

本文撰写的初衷是对书根有文字古籍的修复要点、难点进行分析,因而将笔墨侧重于记录和阐述对复原字迹有帮助的修复技艺上,对于版本源流、修复方案制定等在此处不予以介绍。

【溯源】

在古籍修复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书根有文字的古籍,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古籍在其书根处有文字?写书根这一文化现象又是起于何时?带着这些疑问,笔者查阅了相关资料,也得到了一些答案。线装书传统的置放方式是平放的,书根向外,藏书家往往请人在书根靠角隅线处从右往左题写简单的书名、分类、本册的卷次与册次等项,有的古籍首册还题有全书的总册数等信息,以便于后期查阅、检点。因此,写书根成为线装书装帧中的一个环节。

写书根由来已久,至少宋代就已经采取了这种方式。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的宋版《文苑英华》《册府元龟》,书根上均写有书名,据说还是宋人的墨迹。另外,天一阁收藏的明版书大部分也有书根,有的还属明人风格。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部分线装书,直接把书名、卷册印于书根之上,使写书根成为书籍印刷的组成部分。直至今日,许多新印古籍仍在沿用。

基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古籍修复工作中经常会遇到书根有文字的古籍了。既然这样的古籍数量多,并且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那么,如何修复书根有文字的古籍,使书根上的文字得到复原,就成为古籍修复工作者需要钻研的课题。

【指导原则】

古籍修复中的“修旧如旧”“最小干预”“可逆性”原则,同样适用于书根有

文字古籍的修复。因为此类古籍的修复难点明显地体现在“复原”上,所以笔者认为应再加上两点。一是“保持原貌”原则,即经修复后的古籍要尽可能保持和原来一样。二是“尽量少修”原则,即遇到书根有文字的古籍,如破损不太严重要尽量少修,不过多干预。具体到《洛阳伽蓝记》一书,由于书页状态较好,四角磨损,书页有部分开口,上下书口处有缺损,部分书页有裂口,因而我们制定的修复原则是尽量少修,书页拆开采取“哪里破损补哪里”的方式来处理这些问题。另外,在选配补纸、连口纸时要多用心,从纸张薄厚、帘纹、颜色、纸性等各方面来考量,以达到修补后书页平整不变形,为最后书根复原打下良好基础。古籍修复工作是环环相扣的,每一步都应做到位,最后的工作如果有一步懈怠了,那最后的结果就有可能功亏一篑。

【技术要点】

是否需要拆开书册进行修补。针对书根有文字的古籍,若非必要可采取不拆开书册的方式进行处理。比如,针对书页有少量虫蛀、个别裂口、书皮破损等情况,可通过掏补(即在不拆开书册的情况下把毛笔和补纸伸进书页中修补破洞的方法)、修补书皮等方式完成修复工作,尽量不要拆开书册,这是对保留书根文字最有力的方法。对必须拆开书册才能进行修补的古籍,要从选配补纸、修复技巧的运用等方面加以注意,最大程度地复原书根文字,保护古籍。

配纸。以《洛阳伽蓝记》为例,原书页为竹纸,纸张相对较厚,但厚度不一,在0.055~0.061毫米之间,为了使书页修补后平整,成书后无凹凸,需要使用两种纸:其一为补书页的古色混料纸,厚度在0.051~0.057毫米之间,较之原书页略薄,但相差不多,在可控范围内;其二为连口用的染色薄棉纸,厚度在0.033~0.038毫米之间,经染色的薄棉纸薄厚适中,纸质绵软,且颜色与原书页相近,连口后颜色协调,装订成册后,书口处浑然一体,不会出现颜色深浅不一的情况。另外,棉纸条裁切时需竖纹裁,与书页一致,保证书页不变形,否则会影响书根文字的复原。

如果书根有文字的部分出现破损,修补时要注意,不要将补纸补到有墨迹的地方,尽量留出。如果覆盖住有墨迹的地方,文字是无法完全复原到书根上

的,因此需要在书根处缩进一丝,不能稍有长出或覆盖,否则就会湮没书根上的字迹。

喷水。在修补书页的过程中,应尽量少喷水,控制水的用量是为了防止书页变形,影响复原效果。由于纸张的纤维素之间是通过氢键链接的,因而纸张表面与水的结合更容易,纸张被润湿后,处理不当容易造成纸张变形。若需要喷水也要少量使用,喷水时动作要缓,喷出的水呈雾状,纸张泛潮即可。

折书页。要按原来的旧折印折齐,两手顺书口上下抚按平整,同时要看书页头、地脚、书背三面是否和原来一致。有的书页旧有的折口折偏时也不可改正,否则也会影响书根字迹的复原。

装订。装订书捻前要最后确认书根文字的复原情况是否理想,保持原样。对不合适的书页进行微调,在进行这一步骤时要保持心态平和,不可急躁。正如古人对从事字画古籍修复工作者提出的要求所言:“良工须具补天之手,贯虱之睛,灵慧虚和,心细如发”,充此重任当不负所托,作为专业的古籍修复工作者须始终谨记这个要求,并在工作中践行。

在此引申一点,有的书根有文字的古籍破损严重,出于“抢救”的需要,必须衬纸时应如何操作呢?我们的原则是既有书根字迹,又须衬纸时绝不可以裁切、打磨见新。为了达到整旧如旧的要求,具体做法是把衬纸喷潮压平后,拿出一册书籍页数同样数量的纸张,按照书册的大小把衬纸裁成比书略小一点的单页纸(若用双页注意衬纸不能太厚)。如果书有数册不能一次裁切,需要逐册按照原书裁纸,因为一部书不一定大小一致,只有一册一册地按照原书裁纸才能大小合适。把衬纸裁好后再按一般衬纸的方法把纸衬入书页内墩齐,因为衬纸比书页略小所以看不见纸的新茬,且衬纸用单页压平后更服帖,仍能清晰地看到书根字迹。另外,这种衬纸方法一定要选用和原书页颜色相近的衬纸,才能更协调。这样的做法也是肖振棠《中国古籍装订修补技术》一书中针对书根有文字古籍提出的衬纸方法。

以上是笔者在完成《洛阳伽蓝记》的修复工作后,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并结合书根有文字古籍在修复工作中常见的问题及解决方法做的一个梳理总结,其中有欠妥当、不完善之处,烦请前辈和老师们指正。



修复前的《洛阳伽蓝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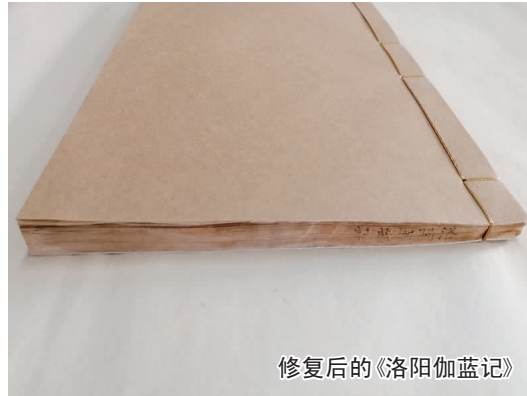
溜口



捶书



齐书页



修复后的《洛阳伽蓝记》

中小型图书馆地方文献建设刍议

□ 史晓丹 (山东省菏泽市图书馆)

地方文献建设是各区县图书馆资源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各地区中小型公共图书馆的特色资源和优势所在,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随着各地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地方文献的搜集整理。在地方文献建设中,各区县图书馆在馆舍建设、设备配备、收藏与阅览条件、人员配置等硬件方面已相当不错,但在顶层设计、管理水平、开发应用等方面亟须加强。笔者从事地方文献建设多年,在工作中有一些体会,想在此和大家分享一下,供大家参考。

地方文献的收藏范围。什么是地方文献,学术界有争论,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难做出严格的界定。在实际工作中,我们认为地方文献就是与本地区有关的各种文献。为了便于开展工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分类,如可以分为历史文献和现代文献。所谓历史文献,就是1949年前(具体时间可以适当后延)产生的文献;所谓现代文献,就是1949年后以各种形式流传的文献。历史文献征集与管理较为简单;现代文献比较难处理,内容庞杂,载体多样,数量巨大,价值不容易判断,图书馆保存哪些,需要认真鉴别。在征集地方文献时,范围应该宽泛,以免遗漏。将收藏的地方文献分类编目保存时,可以根据本地实际情况,淘汰掉一些目前价值不大、与本地区关系不紧密的文献,将这类文献分到其他阅览室(书库)保存。地方文献的种类和收藏范围也会随

着社会发展不断变化,包括邻近地区或与本地交往频繁区域的文献。

地方文献的征集。地方文献的征集方法有很多,不少学者已经探讨过这一问题,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图书馆员也不断总结经验与大家分享。如通过各种途径大力宣传地方文献的重要性、设立专门机构负责、制定激励机制等等。各地区图书馆应该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进行变通,探索行之有效的地方文献征集方法。

例如菏泽地区有一些特色地方文献可以征集,首先,本地区家族观念强,重视家谱纂修,谱牒文献较多,几乎每个家族、每个村庄都有自己的家谱,如果能把这些家谱征集齐全,或复印,或数字化,不但丰富图书馆地方文献,也为本地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提供有力支撑。家谱是资源宝库,蕴藏着丰富的信息,越来越受重视。2019年3月18日,首都师范大学和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联合成立了中华谱牒文化研究基地,“以收集谱牒、整理文献、研究和阐释家教家风家训为己任”。地方图书馆如能与其合作,不但能解决资金、技术、专业知识等方面的问题,也可以充分发掘这些家谱的价值。其次,菏泽地区有丰富的革命文献,无论是抗日战争时期,还是解放战争时期,菏泽都是重要战场之一,政府和民间保存的原始档案、回忆录等文献,亟待搜集整理。此外,还可以做口述史资料,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不断去世,他们所知道的信息将永远消

失,图书馆如果能采访相关人员,建立口述史资料库,将给后人留下大量文献和精神财富。口述史资料已经受到学术界重视,国内外不少高校和科研机构正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地方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本地区资源,建立口述史资料库,展示本馆特色资源。

在征集文献时,要注意新型文献及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搜集、整理与存储,如微信、民间艺术、技艺的数字化存储等。现阶段,微信已经成为人们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家族群、单位群、校友群等名目众多。微信群里信息资源丰富,有些颇有价值,如何征集、保存这些资源,是图书馆应该研究的一个新课题。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受到重视,如何把这些资源转化成不同类型的文献资源,长久存储,也值得图书馆进一步研究。地方文献种类多,内容丰富,在征集地方文献方面,区县图书馆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大显身手。在地方文献和文化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图书馆应该有所作为。

地方文献的保存与利用。地方文献征集到馆后,最关键的工作是对其进行分类编目,分类合理,就便于储存和查阅。在保存文献方面,纸质文献的保存已经有丰富经验,难点是数字文献的保存。借鉴别人的经验,将馆藏重要纸质文献数字化,方便读者利用,实现长久保存,是地方图书馆将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的艰巨任务。收藏地方文献不仅仅是为了保存与保护,还

是为了开发利用地方文化资源,进而实现地方文化的有效传播。为读者提供借阅服务、为政府和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只是地方文献利用的一方面,图书馆不能满足于提供这些服务,还要积极主动地多方面利用地方文献。图书馆可以联合地方政府、企业、学校、媒体、报刊杂志等,对地方文献进行多角度开发利用,如举办展览、开展地方文献讲座、录制地方文献专题片、在报刊创办介绍地方文献的专栏、与高校和科研机构合作研究地方文献等等。对我馆来说,则可以围绕着开发菏泽牡丹文献开展系列活动,举办展览、讲座等。菏泽种植牡丹历史悠久,历代文人墨客留下了大量有关牡丹的诗文、绘画等。图书馆搜集相关文献,利用现代化手段,每年牡丹节期间在牡丹园展出,平时还可以在各地图书馆、中小学校巡展。此外,为了加强宣传,有条件的图书馆应自己制作一些短视频,供读者免费观看、使用。如在菏泽牡丹节期间,我馆结合馆藏文献,制作历代咏牡丹的诗文、介绍牡丹品种等知识性短视频。这些可以免费观看的短视频,传播的不仅是知识,还是思想,激发起人们对家乡的热爱和眷恋,关心家乡的发展,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地方区县图书馆有搜集、保存和传播地方文献的职责,也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在硬件建设越来越好的同时,也应该重视顶层设计,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开发地方文献资源,为地区经济文化发展作贡献。

藏书故事

思贤讲舍本《晏子春秋》“完璧”记

□ 陈伟军 陈鸣超 (广东省遂溪县审计局)

笔者曾在一篇短文中说过:大凡喜欢读书、买书的人,家里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残缺不全的图书。这类书,或者有上卷,没下卷;或者有第1册、第2册,缺第3册、第4册;或者有前集,欠续编……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要把此类残缺不全的书搭配成套,新版本容易,老版本较难;普通版本容易,线装木刻本则难上加难。笔者在书山书海翻爬打滚几十年,经手、经眼的木刻本断简残册不计其数,然而,其中能够搭配成套的,可谓寥若晨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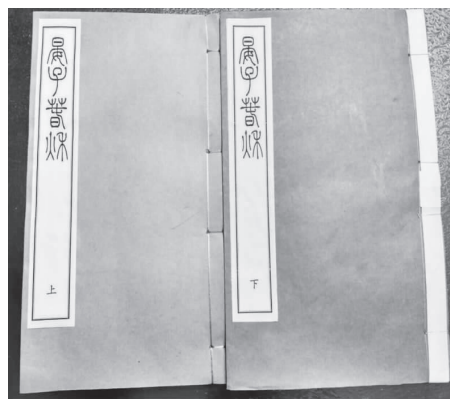
湖南思贤讲舍本《晏子春秋》七卷,平江苏舆集校,清光绪壬辰年(1892)孟秋刻印。此书“以孙(孙星衍)本为主,用诸校本参佐之,择善而从,谊取其安”(苏舆校本《晏子春秋·例略》),是学界、藏家珍重的善本之一。笔者由于仰慕晏子的智慧,很想寻一部木刻的《晏子春秋》来看看。2014年7月,笔者在湖南长沙长沙怀书社见到此书的下册(思贤讲舍刻本,存卷四至卷七),标价300元,就与店主联系,要求酌减。店主向先生得到消息给我打电话,同意折价转让。向先生是湖南大学古典文学的教师,对古代文献、古籍收藏有精深的见解和研究,谈“生意”时还跟我交流《晏子春秋》相关版本的优劣,态度谦逊友善,给我留下良好的印象。

《晏子春秋》下册很快就寄来了。线装,白纸,大开本,墨色黑浓,是比较初印的刻本。书前数叶有些破损,想修补一下,可是找不到同样的纸张,一时不知如何处理。我把顾虑跟向先生说了,他的意见是:“善本书不用修补。”想想也是,这书纸张很薄,如果用其他纸修补,一来颜色有异,二来厚薄不同,硬是粘上去,效果不好。于是我只用牛皮纸加固封皮,并贴上书名的标签。

思贤讲舍刻本《晏子春秋》,一般分装二册。有了此书的下册,我得陇望蜀,又想得到上册。我隔三差五地上网查找,如此坚持两年多,其间看到过此书的浙江书局本、崇文书局本、新化三味书局本、四部丛刊本、古书丛刊本、石印本……却没有我需要的思贤讲舍刻本。2017年9月,我在电脑上键入“晏子春秋”四字,屏幕上突然出现一行字:“清代官刻本、大开本、初刻初印《晏子春秋》卷首一厚册!”这条略带噱头的信息令我兴奋不已。仔细看去:正是光绪年间湖南思贤讲舍的《晏子春秋》上册,即我缺欠的卷一至卷三,而且也是大开本。可惜尺寸规格不同,比我的下册小了一些,又是竹纸。二者虽有差异,但却是同一版本,若搭配成套亦无伤大雅。此书起拍价580元,我想:即使以底价竞得,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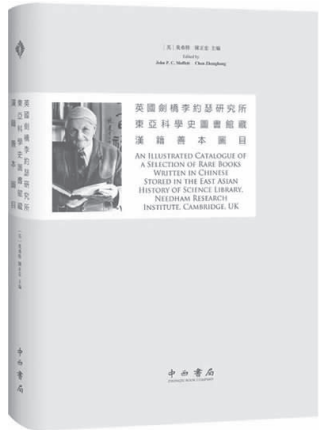


上佣金、邮费,至少也要600元。作为不成套的残册,还是贵了。于是,我不动声色,静观其变。两天后,拍卖“流产”。接着,卖家又以580元的底价上拍,如此再三,但均以流拍告终。卖家沉不住气了,将底价减至380元。我估算一下:这个价加上佣金、邮费,共要400多元,还是贵!于是,我“外甥打灯笼——照旧(舅)”,不予理睬。十几天后,卖家兜不着主顾,不免气馁,把底价削减为290元。我揣摩:时机已到,不能等了。如果价钱再低,竞拍者会蜂拥而至,争抢起来,后果更糟。因我已拥有此书下册,占有优势。这个价钱,对他人是



高价买次品,于我是“捡漏”占便宜,相信没人跟我“抬杠”。主意拿定,就在拍卖即将结束时,我果断地点击“出价”按钮。过了30分钟,查询拍卖记录,果然不出预料:此书仅我一人参拍,没有“搅局”的竞价者。

十天后书寄过来,我用相同的纸张(从古书里拆下竹纸)补好破损书页,扣上跟下册一样的书皮,粘上书名的标签,这部清光绪十八年(1892)思贤讲舍本《晏子春秋》终于配套成功,成为“完璧”。我亦收获了由于古籍“破镜重圆”而带来的欣喜和激动!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

主编: [英] 莫弗特·陈正宏
出版社: 中西书局
出版时间: 2020年4月
定价: 228.00元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是世界研究中国科技文化的中心, 该馆藏丰富, 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世界著名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专家李约瑟生前购藏的汉文古籍。本书是关于此部分汉文古籍的整理与著录, 收录汉籍善本近百种, 据该馆特色分为“经史之部”和“子丛之部”, “子丛之部”又细分为儒兵农家类、医家类、道释类、术谱类、杂家类、类书丛书类等六小类。

□ 莫弗特

在从事中国文化研究的近六十年中, 李约瑟博士搜集了近七部百部汉籍。复旦大学的陈正宏教授从中挑选了一百部, 编纂成本图录。李约瑟博士并没有搜寻精美或昂贵的珍稀善本古籍,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并不是一位传统意义上的藏书家。他之所以搜购和收藏这些书籍, 是因为它们对他的前现代中国科学、技术和医学的研究至关重要, 其中部分书则是他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以后, 李约瑟博士就一直在英国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政治活动。他对中国产生兴趣, 正逢1937年日本

一位从事有关中国的研究和汉籍收藏的外国学者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东亚科学史图书馆藏汉籍善本图目》序

全面入侵中国之时。他在英国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促进为中国提供援助的活动中, 比如“拯救中国运动”。一位在牛津的中国访问学者罗忠恕成立了一个牛津委员会, 旨在唤起学术界对中国困境的认识, 争取他们的支持。在听了罗忠恕一次慷慨激昂的主题演讲后, 李约瑟在剑桥也成立了一个类似的委员会。李约瑟支持和鼓励中国革命的消息传到了中国的科学和学术机构, 如中央研究院。通过这些活动, 他与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员的关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此时, 他对中国科技文化遗产已经产生了兴趣, 而且他和鲁桂珍正在为撰写一篇这方面的论文收集素材。他还开始考虑是否能和他的妻子到中国休一年学术假。

二战在欧洲爆发后, 李约瑟觉察到自己的事业前景不明。于是, 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四处活动, 以期被派往英国的新盟友——中国, 来充分发挥和运用其科技专长及快速增长的有关中国的知识。

李约瑟终于在1942年年末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他启程前往中国, 途经美国、非洲、中东和印度, 并于1943年2月抵达昆明。他从昆明奔赴重庆, 很快就在英国大使馆成立了中英科学合作馆。他的工作就是在大学、政府和工业实验室工作的中国科学家以及分布在“自由中国”地区的工厂提供物质和道义上的支持, 所谓“自由中国”地区就是指中国广阔的西部和南部腹地, 这些地区还未被日本侵略者占领。在一大批中外科学家和后勤团队的支持下, 他和同事们跋涉数千英里, 访问了三百三十多家组织机构, 并为身陷困境却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工作的中国科学家提供了书籍、期刊及大量实验室基础设备。他在信件、日记和照片以及随后的两本书中, 记录了自己的经历。他还以卡片索引的形式记录了与近两千五百人的会面, 这些构成了他在科学界的社交网络, 对他未来有关中国的研究和收藏汉籍至关重要。

从抵达中国的那一刻起, 他便开始就

中国科技史和医学史的诸多问题向学者们请教, 并向他们寻求关于搜集汉籍和文章的建议。他的旅行日记, 载录了他四处购买大量线装书(包括价格)的情形, 其中还包括一次不幸损失部分书籍的记录。当然, 他也收到了许多精美的礼物, 比如第280号, 以及《天工开物》的一个印本(第005号), 这是由著名学者傅斯年(1896~1950)赠送的, 我猜想这一直是他最珍贵, 当然也是最常用的一部书。

李约瑟于1946年4月离开中国, 在巴黎新成立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自然科学部担任创始主任。在巴黎工作了两年之后, 他于1948年返回剑桥, 开始致力于撰写原计划只有一卷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在中国一般被译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此期间, 他在中国的一些知名的朋友, 如国立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1890~1974)、国立北平研究院副院长李书华(1890~1979), 帮助他购买所需的书籍, 并通过英国文化协会转交给他, 以协助他的工作。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李约瑟与中国的交往翻开了新的篇章。在剑桥, 他在一位严谨的研究者王铃的协助下, 全力推进《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的写作。王铃(1917~1994)是一位来自“中研院”的历史学家, 于1950年后得到了中国科学院的部分资助。王铃是帮助李约瑟研究的核心人物, 因为他首先翻阅李约瑟收集的汉籍以寻找其关注的部分的。他会在这些书中适当的地方插入一张签条作标记, 而本图录收录的古籍中保留了许多这样的签条, 显示出李约瑟工作中使用最多的资料来源。李约瑟和王铃会定期会面, 查阅这些参考文献, 讨论和修改王铃所作的初步翻译, 并将它们纳入书稿主体中, 这些都成为《中国的科学与文明》里的段落, 从而构成了该书某一卷的内容。

随着他们的研究范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 李约瑟多方搜寻, 来满足他日益增长的汉籍需求。1946年他曾经访问过魏智在北

京的书店, 此后他联系这家书店, 给他们一张书单向他们购买所需书籍。1951年魏智的书店关闭后, 书单上的大部分书籍最终通过新成立的国际书店购得。他还向香港、美国(Paragon Books)和英国(伦敦的Collets)的书店和经销商搜购书籍。

李约瑟在1952年、1958年、1964年、1972年对中国进行的一系列长期学术访问卓有成效。此外, 1978年、1982年及1986年他还对中国进行了短期访问。前三次访问在搜集研究资料、丰富藏书方面对他来说是最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外封或函套上他所作的批注、所钤印章, 以及散见于和这些访问相关的档案(尚未经整理编目)中的书单和收据, 来确认某些线装书的购买地点和时间。例如1958年访华时, 他刻了两枚中国四字成语“走马观花”(本意是做某事令人心境愉快, 但是后多指观察了解过于粗略)的印章, 这一年他在中国买的书, 就都钤有这两枚印章, 比如医19和医22。

他的老朋友们再一次在促成这些访问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别是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早在1951年, 在解决是否允许李约瑟将他购买的线装书带回英国这个问题上, 竺教授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二十世纪前印刷的图书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 携书出境必须具备特殊的出口许可证, 竺教授获得了这些必要的许可。到了1958年, 禁止出口书籍的范围从1795年前的出版物扩大到十九世纪及以前的出版物。李约瑟写信给竺教授, 请求鉴于他开展的研究对这些书的特殊需求, 允许他将一些自己购买的十九世纪的书籍带回剑桥。竺教授再次促成了这件事。

事实证明, 李约瑟图书馆入藏的最后一批线装书, 主要就是得于这些访问期间。不过, 馆藏古籍也包括1995年李约瑟去世前后来自他人的一些赠书, 如第453号和454号, 就是最近由帕梅拉·尤德女士赠送给图书馆的。



《君子人格六讲》
作者: 牟钟鉴
出版社: 中华书局
出版日期: 2020年1月
定价: 42.00元

转变德育方式 培育社会精英 《君子人格六讲》序

□ 牟钟鉴

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教书三十余年, 看到一批一批的各民族青年学子健康成长, 毕业后在各地各领域发挥生力军作用, 深感国家有光明前途, 人民教师职业光荣。

当前我国教育事业正处在改革创新的关键时期, 从智力教育为主转变到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是不容易的, 仍面临诸多挑战。中小学学生面临升学率和升名校的困扰, 大学生面临拿学位、找工作的压力, 都过得不容易。但是立德树人的大目标是明确的, 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向这个目标奋进。学校的德育课, 有的由于脱离实际、教条气息较重, 对学生的吸引力不大, 效果始终不佳。

这几年我一直在想, 数千年中华文明培育出无数精英, 成就了中华民族的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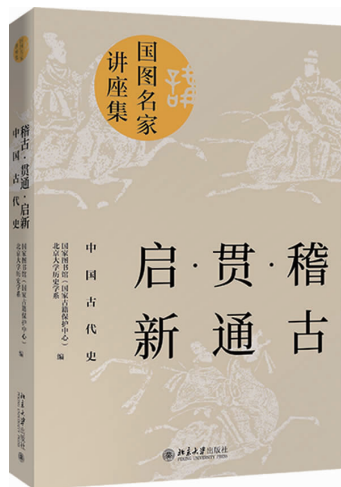
大, 使之历久弥新, 其秘密在哪里? 我认为在道德教化。其中有两点是突出的: 一是提炼出“君子”作为人格养成的范式, 成为道德自律和监督的公认标杆; 二是结合做君子的道德要求, 讲好中国故事, 用历史真人真事, 使道德理念呈现为活生生的人的言行, 来感动青少年。

我们今天为什么不借鉴这一成功的经验, 使德育教学活泼起来呢? 于是我依据学习中华经典积累的经验, 结合自己生活中学习的体会, 也参考了一些论君子文化的文章, 用数年的不断思考, 构建起“君子六有”的理论框架, 即“一曰: 有仁义, 立人之基; 二曰: 有涵养, 美人之性; 三曰: 有操守, 挺人之脊; 四曰: 有容量, 扩人之胸; 五曰: 有坦诚, 存人之真; 六曰: 有担当, 尽人之责。”随后又用一系列历史故事作为例证, 使之具象

化。历史故事涉及的人物, 从孔子、孟子、司马迁, 直到现代革命家, 共三十多位, 他们都是中华精神在不同时期不同职守上的体现, 都是君子人格的榜样。

以上就是本书的缘起。我希望它能得到老师们的关注和使用, 对改变德育课的“教训”面孔和“灌输”方式起点作用, 推动德育向唐代大诗人杜甫《春夜喜雨》“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的境界迈进。当讲君子、学君子、行君子成为学校普遍的风气时, 社会道德建设也会随之出现新的面貌, 我期待着这天早日到来。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原中华书局经典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祝安顺先生的关心、启示; 责编李猛在编辑过程中认真、负责, 遂使本书得以问世, 谨致以诚挚的谢意。



《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
编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北京大学历史学系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定价：70.00元

此书为国图名家讲座系列之中国古代史讲座的整理汇编。主讲人为北大历史学系和考古文博学院的张帆、刘绪、朱凤瀚、韩巍、陈苏镇、叶炜、陆扬、邓小南、党宝海、李新峰、郭润涛等十一位资深专家。开篇为总论，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和特征进行总体评述，然后按照时间顺序，分为史前和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蒙古和元、明、清，综合运用各种史料，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进行讲解，展现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做到了以详实的史料为基础，不仅介绍史实，同时介绍掌握理解分析史料的方法，最终达到对中国历史初步但全面的了解。

□本书编委会

“中国于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尊史、学史、治史、用史的文化传统一直延续至今。近年来，“国学热”及其相伴生的丰富多元的传统文化普及资源，也已经孕育出相当规模的高水平历史爱好者群体，他们对单纯猎奇、讲故事之外的严肃历史问题产生兴趣，且审视的水准也达到了很精致的程度。他们渴望得到一流学者的指点，得其门径而入，将类比的触角突破时间的尘封，引发“今月曾经照古人”的共鸣。

针对这样的精神文化需求，致力于挖掘馆藏经典文献、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广大公众提供免费、终身、优质社会教育的国家图书馆联合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从2018年10月起，举办“稽古·贯通·启新——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名家讲座”。稽古一词出自《尚书》，即考察古代的事迹，总结知识与经验。乾隆皇帝在编纂《四库全书》的上谕中说：“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历史具有整体的脉络，“贯通”是学习历史的重要方法。近代著名哲学家马一浮先生说，光有知识还不能称之为学问，要在一个“通”字上下功夫，知行合一就是求“贯通”的认识论，就是弄懂这门学问的方法。“启新”是学习历史要达到的目的。材料要新，观点要新，方法要新，“新”是学问的着力点，也是学问的功用。今天，党中央特别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赋予“启新”以更深的含义。

系列讲座以此为出发点与立足点，延请北京大学历史学系、考古文博学院十一

博古通今 启迪后人

《稽古·贯通·启新：中国古代史》出版缘起

位知名学者，以历史时段为序，在国家图书馆文会堂，面向社会公众讲授中国古代史。10月10日，北京大学历史学系主任、著名元史学者张帆以“中国古代历史的分期和特征”为题，率先开讲，向听众整体介绍中国古代历史，特别是帝制时代历史的基本特征与研究思路，使观众对中国古代史的基本脉络和研究状况有初步了解。随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刘绪教授，历史学系朱凤瀚、韩巍、陈苏镇、叶炜、陆扬、邓小南、党宝海、李新峰、郭润涛等学者先后登场，通过一两场讲座的时间，勾勒出史前与夏、商与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辽金西夏、元、明、清等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风貌。学者们的讲座重点各有不同：或侧重断代特征的整体把握，如邓小南先生综合运用各民族语言文字、史籍文书材料，对宋辽金西夏等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诸层面如数家珍、面面俱到；或侧重个人研究专长的分享，如陈苏镇先生对春秋与汉道的剖析，开启了观众对于两汉政治文化的深入思索；或以问题为导向，如叶炜教授解读纷乱复杂的魏晋南北朝时，紧紧围绕南朝“皇权消长”、北朝“胡化汉化”两个核心问题，层层深入，不断思辨；或重在开拓观众视野，如陆扬教授讲授隋唐历史时，特别注重介绍国际隋唐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令人耳目一新。或以文本为基础，逐步拓展，如郭润涛教授在谈论清代地方体制问题时，即从《大清会典》的相关材料出发，条分缕析，无一字空谈；有的将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紧密结合，如朱凤瀚先生在讲述商周时期国家形态与社会发展时，展示讲解了大量甲骨、青铜器图片，旁征博引，令观众大开眼界。

系列讲座主讲人均为中国史学界知名学者，其中多位是本学科领域内最重要学

者或资深学术带头人。其研究博而且专，既熟悉所讲断代史的整体情况，又对细分领域有开创性探索，且在北京大学承担一线教学任务达数十年，授课经验极为丰富。因此，系列讲座平实生动、感染力强，主讲人与听众互动频繁，答疑解惑从讲座中延续到讲座结束。

来自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高水平学科团队集体亮相国家图书馆，为社会公众系统讲述中国古代史的前沿研究，迄今尚属首次，是以吸引大量观众来到现场聆听，其中不乏远道而来的外省市观众。每到讲座之日，拥有两百多个座位的国家图书馆文会堂一席难求，观众往往要提前一个小时到场占座，而大量找不到座位的观众或全程站立，或坐在地上听讲，秩序井然、有条不紊。除现场讲授外，光明网对其中五场讲座进行网络直播，对四场讲座进行录播，全部九场讲座点击率总数超过两百万次，社会反响极为热烈。

讲座的顺利开展，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北京大学各院系，乃至全国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高等院校合作开展文化普及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式：即以公共图书馆等文化服务机构为平台，由专门之家守住本学科普及教育的阵地，为有心向学的普通大众系统、完整地讲授专门之学，并与互联网传播相结合，实现专业知识的普惠效应，进而陶铸思想、启迪民智。

为回馈观众的厚爱，并使名家灼见得到更大范围的推广，讲座结束后，主办方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讲稿出版，是为本书。此外，本系列讲座讲稿的整理校订等工作，主要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研究生李屹轩、邢文彬具体承担。在此谨缀数语，聊致谢忱。



《格致·考工·源流：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
编者：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0年1月
定价：76.00元

本书脱胎于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联合主办的“国图名家讲座”系列之“格致·考工·源流——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名家讲座”。

□本书编委会

古籍作为中华文明的主要载体，是当今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智慧源泉。灿若星辰的中华古籍不但包含了中华民族的思想传统、道德观念、文学艺术，也记载着历代先民赖以生存发展的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和生产经验。中国古代科技的卓越成就，以四大发明著称，又远不止于四大发明。许多对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具有重大影响的科技成果，都因为时代的隔膜和专业的限制而不能为今人所了解。因此，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介绍我国源远流长的科学发展脉络、浩如烟海的科技发明成果，是当今科技、文化工作者的重要社会担当和历史使命。

国家图书馆是古籍收藏的殿堂、社会教育的阵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是当今科技史研究的国家队，是中国科技未来发展的思想库。2018年4月，两家单位联合主办“格致·考工·源

流——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名家讲座”，由自然科学史所延请全国科技史领域具有专门之学的十二位学者，在国家图书馆文会堂面向社会公众开讲，普及科技史知识。

4月1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张柏春所长首先以《关于中国古代的重要科技发明创造的思考》为题，对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的重大问题、主要线索进行总括性综述，使观众整体了解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成就与特点。随后，十一位科技史学者依次登台，就中国古代数学、玉器加工、天文历法、指南针技术、法医学、冶金技术、农作物栽培、丝织工艺、航海造船、中西交流与技术传播等诸多问题进行讲解。选题兼顾科学发现与技术发明，文献记载与实践应用，技术变革与社会影响，时代价值与中西比较。

历时三个月的系列讲座通过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相结合、资讯速递与深度挖掘相结合、新闻报道与展览展示相结合的全方位宣传，成为面向大众的科技盛宴。十二

位主讲人不但本学科内卓有成就的一线学者，且大都具备丰富的科普工作经验，是以讲座风格厚积薄发、深入浅出，受到现场观众和线上观众的充分认可，社会反响十分热烈。

讲座的顺利开展，为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与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两家单位，乃至全国文化传播机构与科研机构合作开展科普工作，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成功范式。在这样一次有益尝试的基础上，中国科技文化强大的精神内核，与国家图书馆的社会影响力相结合，必能进一步构建出既传承经典又贴近时代、既传播知识又推进研究、既涵养精英又教育大众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为回馈观众的厚爱，并使名家灼见得到更大范围的传播推广，讲座结束后，主办方委托北京大学出版社将讲稿出版，是为本书。此外，本系列讲座的筹备运作、讲稿的整理校订等工作，主要由自然科学史所陈朴博士、孙昱斌博士，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郑小悠博士具体承担。在此谨缀数语，聊致谢忱。

构建科技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模式

《格致·考工·源流：中国古代科技发明创造》出版缘起